

# 单小花 文学总会改变人生

本报记者 郭晓莹



单小花 摄影 杨旭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前不久，西吉农民作家单小花正式成为中国作协的新会员。谈到自己从一个初中二年级辍学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作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并当选为西吉县作协副主席，她有太多的话想说，最感谢的还是文学：“如果没有文学，很难想象我现在是什么样，甚至，我不一定能活下来。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文学就是我的生命！”

## 生活带给她坎坷与磨难 也给她提供了创作素材

单小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家里生活条件不好，但她没挨过饿，因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疼爱她，把她当成这个家的“小公主”。“儿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妈妈。在我成长的上世纪80年代，边远地区，可以说缺吃少穿。妈妈为了让我们兄弟姊妹不挨饿，瞒着家里人去医院偷偷卖血，换来钱买米买面，还买我喜欢吃的麻花、水果糖。那阵子我太小了，根本不懂卖血是啥概念，如今想起来，真是万箭穿心啊。”每次回忆起来，单小花心里都不好受。

家住农村的单小花，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城上上小学。路远倒不怕，怕的是还要跨过一条河。“那条河平时水不深，也没有桥，只有露出水面的七八块大石头，连接到对岸。石头之间的距离不近不远，但对年幼的我来说，还是有点几远。我天生胆小，有时一步没迈过去，脚就踩进河里，鞋子和裤管都湿了，鞋里还灌进了淤泥、沙子。天热时还好，在太阳底下晒晒就干了。到了深秋、初冬，过河时我就感觉备受煎熬，一旦踩进水里，冰冷的河水混杂着稀泥钻进鞋里，脚底下冰凉，冻得我瑟瑟发抖。”

苏金芳和吴红梅两位同学让单小花至今难忘。单小花回忆，苏金芳的家离学校比较近，“她带我去她家，给我打来热水，洗掉脚上的污泥，把她的鞋子拿来让我换上。遇到刮风下雨，她就留我在她家吃饭、住宿。”另一位同学吴红梅是独生女，家里生活比较富裕，上学时总会带点零花钱，要是买了两个面包，就分给单小花一个，即便只买一个，也会分给单小花一半。“现在我和苏金芳还有联系，但和吴红梅失去联系了，我一直很想她，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会不会想起小时候的我们？”每个给单小花带来光和热的人，她都深深地珍藏在内心深处。

初中二年级，单小花被迫辍学。因为那阵子西吉连年干旱，庄稼收成不好，家里糊口都难。和当地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女孩一样，父母早早安排单小花嫁人了。刚结婚那几年，日子虽然又苦又累，但单小花也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农村妇女，仍按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生儿育女，养牛喂羊，起早贪黑，家里忙外面也忙，地里的活儿一样不少干。她一心扑在家里，几乎没有写过一个字，没看过一本书，只知道干活。

那段岁月对单小花日后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谈到这个问题，单小花稍微犹豫了一下，

又直爽地说：“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我从小被娘家人宠着，不太会干家务活，嫁到婆家以后，所有的家务活一股脑地堆在我眼前，当我做不好时，婆家的人就会指责我，甚至把我当牛马一样使唤，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我年龄太小，根本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娘家人，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委屈。夜深人静时，我经常偷偷地哭，枕巾上都能拧出水来。但是，多年以后我读到一句话——对于作家来说，没有哪段生活经历是浪费的。生活给了我磨难，也给我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有些事我不想用散文表达，就学着用小说的手法去写。”

单小花的丈夫染上了一身坏毛病，赌博、出轨、家暴，一发不可收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单小花只能选择离婚。“离婚以后，我还是农民，却没了土地，也没有住的地方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跟了我，全靠我一个人打工，租房子住，养孩子。由于长期劳累、营养不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患上了肝病、贫血，没有及时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感觉快要活不下去了。”

## 记录亲情、友情、乡情 反映家乡的可喜变化

2012年，病重之下，单小花不得不住院。生活太压抑，她觉得很多话憋在心里，如果再不说不出来，人就要崩溃了。她悄悄给女儿写了一封离别信。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字她都不会写了，只能查字典。慢慢坚持下来，又写出了好几篇文章。她的主治医师马军看过之后，鼓励她去投稿。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单小花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住院时遇到的主治医师马军，是他鼓励我、推荐我去县文联投稿。第二个是县文联的李春燕老师，第三个是县文联的郭宁主席，他们引领我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段历程中具体的辛酸和曲折，我在以前发表的作品中都有记述，在我的新书里也有更为详细的描写。”

2016年5月的一天，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宁夏调研时，来到单小花租住的不足4平方米的出租屋，拉着她的手坐到床边，对她说：“你的屋子很小，但是你的心很大。文学让你走出了这间出租屋，使你内心明亮，面对苦难你没有倒下，而且活得很有尊严。”如今回忆起来，单小花仍有很多感慨：“铁凝主席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坚定了我继续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念，是文学照亮了我的生活。”铁凝不仅在文学上指引单小花，还在生活上给了她极大的帮助。“我现在住的公租房就是在铁凝主席的关心下申请到的，没有她的帮助，没有大家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2018年9月，单小花受邀参加“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她给铁凝

带去了特别的礼物——《葫芦河》《北斗星诗刊》《西吉楹联》三本刊物和西吉农民作家的作品集《就恋这把土》，并汇报了西吉的文学发展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铁凝请单小花代她向西吉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问好，还特意问起王雪怡、马建国两位农民作家的创作和生活状况。单小花备受鼓舞。

2019年，单小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苔花如米》。书中收录了三十多篇散文作品，以农民为书写对象，记录了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种境遇。“这本书是阳光出版社出版的，我特别喜欢《苔花如米》这个书名，算是我半生的写照吧。”她的第二本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即将出版。书中的文章都是她近年来在报刊发表过的散文，一共54篇，分为难忘亲情、那年花开、人间有爱、红色故事、乡土情思、扶贫记忆等章节，共18万字。“这些作品主要是我的成长故事，记录了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也有我的文学经历和我收集整理红色故事、扶贫故事。通过我的所见所感，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富民政策给我的家乡带来的可喜变化。”

单小花说，和自己的第一本书《苔花如米》相比，《樱桃树下的思念》侧重写人间的美好和幸福，少了记忆中的苦涩。“时代在发展，新的故事更贴近当下生活，读者读起来也更容易理解、更容易产生共鸣。从我自身来说，文笔更成熟了。我以前写得太用力，太满，没有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在新书里，我懂得了留白，故事性、可读性更强了。”

文学之路并不好走，但单小花从不觉得辛

苦。“我写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写作的时候是我快乐的时候，这时的我心里没有一丝杂念，身心合一。当没有素材可写时，我就去摘抄我喜欢的文章。非要说苦的话，那就是有时灵感来了，却没有时间及时写出来，等到有时间了，灵感却没了。”

## 对于帮助过她的人 她想永远记住他们

在追梦文学的道路上，单小花有很多难忘的记忆。为了看书和写作，她家中好几个电饭锅都熬干报废了。“其中有一次最严重，我把牛排放到电饭锅里炖上，从厨房出来关了门，坐在客厅的板凳上看书。看着看着入了迷，把厨房里还炖着牛排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一锅牛排都炖糊了，电饭锅也烧冒烟了。家里的电闸起了火，吓得我不知道所措，过了一會兒，火是灭了，可是不单我家里断了电，整栋楼也都没电了。”

很多人、很多事都曾感动过、温暖过单小花。“对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尽可能地用文字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怕时间久了，万一自己忘记了怎么办？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记录的人，习惯于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都记录下来，我也希望能将生活给予我的这些感动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善意，更认真地去生活。”单小花道出了许多普通写作者的心声。

单小花独自拉扯四个孩子，他们是单小花的希望，是她精神支柱。“他们从小就特别听话懂事，爱学习、爱读书、爱写作，这也是最让我欣慰的事。我儿子已经光荣参军了，大女儿读大三，二女儿读大一，小女儿读高二，他们阳光乐观，对我很孝顺。”

读书写作，不仅让单小花整个人都变得更加阳光、自信，还带动了身边的“孩子们”受了她的影响，也喜欢读书写作，尤其是她的大女儿，从初中开始写作，如今写出的作品累积到二十多万字了，在学校多次获得过读书与写作的奖状。那些曾经不看好她的邻居也向她挑起了大拇指，称赞她不简单，找他们给孩子推荐好书，指导孩子们写文章。我们村子里也有好几个爱好写作的农民，我帮他们投稿、投书，大家在文学路上共同成长。文学不仅给了我精神的力量，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单小花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第二本书出版以后，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目前她也在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希望将来可以顺利出版。“我会继续努力地写，一定不辜负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人，不辜负爱我作品的读者朋友。再有就是等孩子们学业有成之后，我想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出去走走，与朋友们聚一聚，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

## 专访单小花

### 一本好书就像镰刀 割掉心里疯长的草

记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的心情吗？

单小花：2012年，我生病住院，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写下了一些内心的想法，被主治医师马军看到，鼓励我去县文联投稿。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信心，感觉会被拒之门外。但出乎意料的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张像花一样灿烂的笑容。她是县文联的李春燕老师，她的热情瞬间打消了我心中的顾虑。她把我的文稿交给当时的县文联主席郭宁。郭老师看了之后说：“写得很朴实，很接地气，有些内容看后就像锥子一样扎得人心疼，充满了真情实感。”他选出了其中的一篇，让李春燕老师帮忙整理成电子版，准备在《葫芦河》杂志刊发。他还送了我一本书，让我带回家慢慢读。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收到了样刊，那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瞬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捧着样刊读了很多遍，看着自己的文字，心里的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时隔不久，我得到了300块钱稿费，那是我第一次挣到稿费。当年我挖蒲公英贴补家用，挖一天才能卖20块钱，这300块钱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也更有勇气投稿了。

记者：在您心目中，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单小花：文学点亮了我的心灯，是我灵魂的港湾，快乐的乐园。对我来说，文学就是我对生活的记录。虽然写作者会做艺术性的虚构，但文学终究还是根植于生活本身。文学就是把过往的人与事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与我们上学时写日记、周记、作文有相似的地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记下来就可以了。至于诗歌，虽然我也是中国诗歌学会的会员，也曾发表过一些短诗，但我觉得我写得并不好。从我内心来说，对诗歌还是存有敬畏的，不敢随便写。在我看来，诗歌也是生活的另一种记录和表达方式，更精炼、更直接、更有艺术性。

记者：读书写作改变了您的命运，您觉得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单小花：一本好书就像一位良师益友，能在痛苦时给我安慰，绝望时给我鼓励。一本好书也像一把锋利的镰刀，能割掉我心里疯长的杂草，使我有寄托精神的港湾。看书时我会将一切抛在脑后，只想走进作者笔下的世界，沉浸在作者描写的人物故事中。那几年家里太穷了，孩子的语文课本、家里的旧报纸、路边买来的旧书，在我看来都是宝贝。在我的生命里，书就像一把救命稻草，把我从万丈深渊里拽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像一服灵丹妙药，治好了我的伤痛；更像天使，给我带来了快乐与幸福；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点燃了我的心。

记者：您想对农民写作爱好者说些什么？

单小花：我想说，我们农民不仅能拿着锄头种地，也能拿起笔写出好作品。文学点亮了我的心灯，我也希望能以一盏灯点燃万家灯火，照亮我们新时代农民的文学之梦。

## 单小花

农民作家，1978年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从事文学创作多年，作品散见于《黄河文学》《朔方》《文艺报》《作家通讯》等报刊。出版散文集《苔花如米》。

## 讲述

### 时代楷模、大爱医者李桓英，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祖国 只为世间再无麻风病

口述 李璟璐 整理 何玉新



2021年，中宣部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褒奖她是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杰出典范，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2022年11月25日，李桓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青年作家李璟璐1987年生于北京，有多篇报告文学作品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等编写的年度报告文学选集。经过两年多的采访调研，她创作了纪实文学《苍生大医》，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厚重的文字生动还原了李桓英同志漂泊成长、归国献礼、抗击病魔、以身许国的百年传奇，深情回顾了地她作为“战麻斗士”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深刻展现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心有大我的医者形象和跨越时代的爱国情怀。

## 一位充满激情的科学家形象 逐渐立体、丰满了起来

麻风病与梅毒、结核并称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仍有52万同胞遭受麻风病的折磨。1958年，37岁的李桓英放弃国外优渥的物质生活，只身返回祖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和同事们奔波在祖国的偏远山区，救治一个

都是考验。加上李桓英教授年事已高，不太可能直接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采访只能从与她认识的人入手。我和北京友谊医院负责宣传的王珺等人数次沟通，仔细敲定采访对象，同李桓英教授的助手袁联潮老师共同找寻那些和她有过交集的人，勾勒出李教授的前尘往事。在北京友谊医院麻风室同事们眼中，李桓英教授是一位既慈祥又严厉的大家长。她关注每位同事的成长，有时近乎严苛；她也关心每位同事成长中的烦恼，有时化身慈母。她既是俯身基层的普通医生，又是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的科研工作者；既是桃李芬芳的教师，又是联系多方的社会活动家；既是排除万难的归国华侨，又是家在山西的老北京。

我先采访了云南省疾控中心的杨军、四川省皮研所的胡鹭芳和宁夏、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医院的刘放鸣，山东省潍坊市皮防所的郑大有等数十人。在云南、山东、贵州、四川等地麻风病防治战线老同志座谈的讲述中，一位充满激情、情感丰富的科学家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中立体、丰满了起来。

访谈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李桓英留学时所在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上世纪50年代李桓英住集体宿舍时的邻居，她在中央院所工作时的同事，她的亲属，甚至她在云南做现场防治时的司机尹师傅，她

常去的烧饼摊的摊主，买水果的小店的店主，我们都没有错过。

大家依然记得——那个把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说话大嗓门、徒步走上一天也不喊累的人；那个因为有人漏记了病人的一项数据而急得跳脚的人；那个为了排查一个疑似麻风病患者而不惜夜里几次驱车家访的人；那个为了提高基层麻风病防治人员待遇而奔走呼号的人；那个因为有的领导对麻风病防治不重视而当面和领导拍桌子的人……一些和李教授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已经谢世，但他们的后代中不少人依然从事着防治麻风病事业，这不能不说没有受到李教授的影响。

## 开展麻风病防治 不只医病，还医人心

在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时，李桓英教授不只是医病，还医治社会的误解，医人的心。她改变了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对这个病的偏见，也改变了麻风病患者自我隔离、逃避社会的心魔。

我看到了李桓英教授跟踪记录麻风病患者服药的工作手册。密密麻麻的一行行文字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她刚到曾被打上“麻风村”标签的云南省勐腊县曼南醒村时，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社会上对麻风病患者恐惧、歧视，麻风病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对治疗缺乏信心，又难以做到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患者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扔进水塘。李教授十分着急，挨家挨户做工作，每天把药送到患者手上，亲眼看着他们服下。她和团队成员把这里47名患者每人每天每次的用药情况都记录下来，连续27个月，她拍着胸脯保证：“我们每年都来，治不好就再找新药！”

麻风病的传染点究竟在哪儿？有

好多合并症，周围也找不到密切接触者，所以怀疑土壤、环境有问题。李桓英教授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跟随医学前进的脚步，从细胞层面进入到分子生物学，发现了易感的基因，推动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站在最前面的一位新党员就是当时95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她说：“我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我为人民服务快60年了，按照党员的标准，我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病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 护佑天下苍生 诠释赤子大爱

以李桓英教授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至今已资助北京15批260余名中青年医学骨干前往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学习深造，培养了一大批爱党爱国、扎根中国大地、厚植人文情怀、具备国际视野的优秀医学人才。2018年，李桓英医学基金会组建医疗队，来到曼南醒村。村民们与医疗队员热情地打招呼、话家常、聊近况。在得知医疗队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究麻风病患者自滴血疗法加速麻风溃疡愈合的效果时，村民们十分配合，十几名皮肤仍有麻风溃疡的康复者争着伸出手臂：“来，抽我的血吧，我们能做的，一定做。”工作完成后，村里一些老人还关切地询问起李妈妈的情况。“李妈妈”，是村民们对李桓英教授的称呼，他们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教授时的情形：“那个北京来的医生不戴手套，不穿隔离衣，不光和我们握手，还跟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呢。”李桓英教授说：“我就不怕，医生不能怕，我怕自己会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

我能治好它！”

两年的时光，一些平日里联系不多的人，因为这本关于李桓英的书聚到一起。通过他们的叙述，我看到了一幅画面——李教授初到曼南醒村时，不做任何防护，帮患者脱鞋、俯下身，捧起他们的脚，认真检查；李教授与父母在香港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时光流转，下一张照片里，她神情哀伤地坐在父母墓碑前，旁边是一束怒放的鲜花。

姜春燕、田丽两位医务工作者，既接受过李桓英医学基金会资助出国深造，又是李教授住院时的主管医务人员。田丽护士长告诉我，她和李教授的初次相识就在医院的一条小路上。几年后，李教授年龄大了，常常住院，出病房的机会越来越少。每次经过那条路，田丽总会下意识地看着，仿佛李教授会在拐角处出现。

和李教授的同事陈小华老师对话时，我们谈到了李教授的年龄，陈老师突然就落泪了。她的眼泪让我错愕。原来，她是心疼李教授在慢慢衰老。这让我感到，年轻人与李教授之间如同子女和父母一般，对于她的百岁高龄，年轻人有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复杂情愫。

2022年盛夏，我来到病房探望李桓英教授。她很开心，把我拉到身边。我请她写下几句最想对读者说的话，她欣然题写：“我是中国人，我的归属就是我的国家。我必须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祖国。”这句话被我们用在了《苍生大医》这本书插图的第一页。